

文史资料精选

(第六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79303

K2506/2:5

文史资料精选

(第 六 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 黄绍竑(1)

新桂系初起的形势——黄琪翔第四军回
粤以后——汪精卫回粤的阴谋——蒋、
汪勾结和当时我对他们的态度——汪精
卫骗我去广州的电报——11月16日广州
事变——我们在香港的布置——广州公
社起义——大战前双方部队的情况——
缪培南的战略——我们的战略部署——
东江大战——尾声

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 程思远(20)

蒋桂战争前国民党新军阀的对峙局面
——蒋介石起用俞作柏向李明瑞策反
——桂系妄兴鲁案给蒋以可乘之机——
白崇禧出走，李济深被捕，蒋介石下令
讨桂——李明瑞阵前倒戈——俞作柏主
桂后所采取的政治措施——中共中央代
表邓小平到南宁指导工作——南宁事变
前的广西局势

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 刘 骥(35)

DK 5
蒋冯阎之间的合作和分裂——战争发展的
基本情况——战争的结局和西北军的
崩溃

帮助蒋介石瓦解阎、冯部队经过…… 张 钫(66)

我和冯玉祥的关系和我参加这次战争的原因——进出亳州——代蒋收买部队——蒋介石过河拆桥

汪精卫与扩大会议…… 李俊龙(80)

扩大会议的成立经过、组织机构及其政治纲领——张学良的沉机观变与武装干涉——撤退到太原以后——汪精卫的最后一着棋

阎锡山与扩大会议…… 冀贡泉(95)

酝酿经过——促成经过——停滞经过——收场经过

冯玉祥与扩大会议…… 邓哲熙 戈定远(105)

“非常会议”前后…… 周一志(109)

关于《非常会议前后》一文的补充…… 杨玉清(127)

有关《民众导报》的订正…… 胡彦云(132)

宁粤合作亲历记…… 陈铭枢(134)

我在广东——宁粤分裂前后——我与蒋介石的勾当——“九·一八”事变后

——南下议和——蒋汪胡会见后的波折
——蒋介石被迫下野——四届一中全会
——孙科政府种种——财政外交逼孙科
下台——烟霞洞会议

关于币原之死的更正·····	周一志(173)
两广“六·一”事变·····	刘 斐(174)

西南方面与蒋介石对立的历史过程——
事变第一阶段——事变的第二阶段

有关《两广“六·一”事变》的补正·····	林仲葵(208)
我所知道的改组派·····	范予遂(210)

改组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改组派的组
织情况——改组派的政治主张——策动
军事反蒋，迫蒋接受“汪蒋合作”——
几句结束的话

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	周一志(231)
关于再造派·····	周一志(248)
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	王又庸(257)
蒋介石在溪口·····	张明镐(276)

蒋氏先系及其家族——蒋介石的早期生
活——蒋介石在溪口的活动

关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的改正 与补充·····	何国涛(332)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下野返浙点滴·····	章 培(336)

白、李、何“逼宫”——周凤岐“逐客”
——侍卫队抢劫余姚银行——绍兴遭池
鱼之殃——替死鬼王天培

近代水利科技先驱者李仪祉先生…………… 李赋都(342)

怀念杰出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

先生…………… 黄汲清(350)

回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

现…………… 裴文中(357)

《新民报》二十年…………… 陈铭德 邓季惺(365)

前言——从创刊到抗日战争——抗战 8
年——从抗战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
争到全国解放

荣家经营的纺织和制粉企业概述…………… 李国伟(450)

裕大华企业四十年…………… 黄师让(465)

企业简介——楚兴时代——大兴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其他
企业——公司及公司负责人对其他主要
企业的投资——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
的部署和安排——个人对裕大华企业生
产、经营的体会

我所知道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召 川(537)

蒋介石禁烟的内幕…………… 萧觉天(558)

挂起禁烟拒毒假招牌的原因——蒋介石

不可告人的秘密——禁烟督察处的组织
及其内容——农民银行与特 贸 的 关 系
——禁烟总会与禁烟总监——广东禁烟
特派员公署的成立与经过

一九二八年粵桂战争

黄 绍 竑

粵桂自1915年以来就断断续续地发生战争。1921年以前，是旧桂系陆荣廷与广东之间的战争；1927年以后，是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与广东之间的战争。我现在所写的是后一阶段的第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是由于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反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把持下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并反对桂系黄绍竑伸张势力到广东而引起的，但是情形很复杂，还牵涉到蒋介石和李济深。当时一方以李济深为首，军事上有黄绍竑（桂军）、陈铭枢（粤军）、陈济棠（粤军）、徐景唐（粤军）、舒宗鎰（粤海军）等；蒋派政客则有戴传贤、朱家骅、邵元冲、曾养甫等。另一方以汪精卫为首，参加的有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缪培南、吴奇伟、许志锐、李汉魂、朱晖日、李福林、薛岳、黄镇球等。以后的几次战争，情形更为复杂，两方面有些人物彼此互换了位置，成为交叉循环式的混战，而蒋介石则是战争的操纵者。

新桂系初起的形势

1920年侵入广东的旧桂系陆荣廷等被粤军逐出广东后，次年粤军进攻广西、讨伐陆荣廷，占领了广西的各重要城市，

陆荣廷等逃往上海、苏州，旧粤桂战争至此结束。这时我和李宗仁等人乘机崛起，到1925年的秋天，他们驱逐了侵入广西的唐继尧的滇军，肃清了陆荣廷的残余势力，从而统一了广西。广西的统一，我和李宗仁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粤军李济深、邓演达、陈铭枢、陈济棠也在政治上、军事上直接间接给了他们不少的支持。这就为以后两广合作、两广统一和桂系参加大革命、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直到1927年底，两广之间没有战争。

1927年秋天，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队与蒋介石的何应钦部队在龙潭附近（南京下游）歼灭了孙传芳的渡江部队后，李、白就勾结西山会议派邹鲁等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把持南京政权，蒋介石被迫下野赴日本。而桂系的黄绍竑则与李济深、陈济棠、薛岳等击败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回粤的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把势力伸张到了广东。因此桂系就成为蒋介石、汪精卫等共同反对的目标。

黄琪翔第四军回粤以后

“四·一二”事变后，到7月底汪精卫、陈公博等也在武汉渐渐暴露了反共的面目。但他们既要反对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又不愿在武汉屈居唐生智之下，他们就想利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包括黄琪翔的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贺龙的第二十军）去打南京，创造局面；各军都到了南昌、九江地区。汪精卫提出了“夹攻中的奋斗”的反动主张，既要反共，又要反对南京，他们政治上的口号是“护党”，他们认为国民党已被南京特别委员会篡夺了。但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贺龙部队于8月1日在南昌起义了，这样就打烂了汪

精卫的计划。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入粤，蔡廷锴率十一军一个师东走福建，去找陈铭枢；黄琪翔则率第四军沿赣江与东面的叶、贺部队平行南下，彼此互不侵犯。正当黄绍竑、陈济棠、薛岳等与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梅对战的时候，黄琪翔的第四军就悄悄地进驻广州。当第四军到赣南的时候，李济深派人欢迎第四军回粤。等到第四军到了广州以后，李济深即找黄琪翔商量，要他出兵协同我和陈济棠、薛岳等去打叶、贺部队。黄琪翔当时提出了交换条件，先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疏远桂系；但李济深没有答应，他就不肯出兵，在广州坐观成败。

黄琪翔等以为我及陈济棠等部队未必能把叶、贺部队打败，并且有可能假手叶、贺部队来消灭我等；即使叶、贺部队把我等消灭了，叶、贺部队的力量仍然有限，他们再出兵去打叶、贺部队，仍然可以获得胜利的。如果这样，以后广东的局面就完全由他们掌握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我及陈济棠、薛岳等把叶、贺部队打败了，于是李济深和我就成为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敌对目标。他们首先对李济深施加政治上的压力，要求把李济深的亲信冯祝万的财政厅长换给他们的亲近邹敏初，把朱家骅的民政厅长、曾养甫的建设厅长及农工厅长都换成他们的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也由邓彦华换成第四军师长朱晖日。在军队方面，他们又秘密与第五军李福林联成一气。薛岳、黄镇球两师原来是李济深的基本队伍，他们也早和黄琪翔有了秘密勾结。

10月初，我由汕头回到广州，李济深把种种情形告诉我，问我以后怎样应付他们无厌的要求。那时我觉得我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军队分散，广西空虚，不能不先把军队

主力向广西边境撤退，仅韶关还留有一个师。我想脱身事外，看看以后的演变，同时也想回广西从事“建设”。因此，我对李济深说：“他们要求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好了！横直广东的事由广东人自己去搞，你是他们的老长官，你虽然是广西人，但你不是桂系，他们不会对你有什么恶意。”李济深听了我的话，默然很久。我临回广西之前，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我家去，我把撤兵回广西的情形和以后从事广西“建设”的意愿告诉他们，并希望他们也把广东建设好。表面上大家谈得很融洽。次日我就回广西去了，以为这样的退让，问题就解决了，战争就可以避免了，殊不料问题还在后头呢！

汪精卫回粤的阴谋

汪精卫、陈公博等自“八·一”南昌起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瓦解之后，打南京另创局面的计划流产了，张发奎也脱离了部队，武汉便成为唐生智的独霸局面。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谭延闿、孙科、程潜、陈友仁等纷纷离开武汉，有些投奔了南京，而汪精卫和其亲近大约是11月上旬就回到了广州。他既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亦不满武汉的唐生智。他原来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民党中他是不肯以第二人自居的。他想利用张发奎、黄琪翔回粤的实力，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南京特别委员会对抗，来维护所谓“党的正统”。那时李济深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汪精卫的这个打算李济深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们就定下了送走李济深、骗我来广州加以杀

害的阴谋。

抗战时期，我与李济深、张发奎、吴奇伟等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那时我与张发奎等已经合作了好多年，混得很熟，彼此无话不谈了。大家在火车上谈起1927年广州的事情。我问张发奎：“向华（张发奎号），那时候你们为什么要把李任公赶走呢？”张发奎说：“我对任公劝了不少次，流了不少眼泪，任公都没有答应，”他不说明劝李任公的是什么内容。李济深笑着说：“我当时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叫我怎么答应呢！”当然李济深不会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的，而是不同意罢了。我又问吴奇伟：“梧生（吴奇伟号），假如那天晚上（11月6日晚）你把我拿着了，你怎样处置呢？”他说：“唔唔，恐怕对不住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现在我才清楚：汪精卫他们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反对桂系，但李济深不同意，于是他们就决心把他送走。当时李济深由汪精卫陪着、实际上是监视着过香港，马上搭船到上海。表面上说是他们两人去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取消南京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因为李济深是张发奎、黄琪翔等的老长官，他在广州，不好怎么样做，所以就把他送走了。他们把李送走以后，就把我骗到广州，打算动手捕杀。

蒋、汪勾结和当时我对他们的态度

蒋、汪之间素来是有矛盾的，但为了要反对桂系，他们就统一起来了，勾结起来了。蒋介石因为受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所把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排斥，下野到日本。汪精卫回到广州后，蒋就派宋子文去广州，在葵园汪精卫公馆商量共同倒桂系。当孙传芳大举渡江的时候（1927年8月下旬），蒋介石

石曾密电何应钦令第一军部队向浙江撤退，不与孙传芳作战，说是局势不利，撤退后准备再革命，听由李宗仁的第七军单独对孙传芳作战。蒋介石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想假手孙传芳消灭桂系部队。但是由于何应钦当时已与桂系有了勾结，不肯坐视第七军孤军作战，没有把第一军撤退，于是第一军与第七军合力把孙传芳渡江部队在龙潭附近（镇江、南京之间）完全歼灭。龙潭之役在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战争中，战绩是很大的，但蒋介石却很不高兴，后来甚至要把龙潭战役的纪念碑毁了。蒋介石从此一直不喜欢何应钦，并且更加嫉视桂系。

汪精卫自从行刺前清摄政王之后，我就景仰他的大名了。1926年春，他曾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同谭延闿、甘乃光来梧州访问，那时我就被他虚伪的面貌所迷惑，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的，后来两广统一局面的促成，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两广统一会议中，我觉得他是帮我的，因此我对他更有好感。

蒋介石以前与我接触比较少。我在1927年4月参加上海反共会议后，又和蒋介石同车去参加徐州会议。在火车上我对他说：“像曹万顺、周凤岐等北洋投降部队为什么还原封不动地放在第一军指挥的系统内呢？为什么不把它缴械或分散拨给各军呢（当时所说的“各军”是指第一军和第七军）？”又说，统一广西战争的时候，我们对于旧军是一律缴械或分散给自己的基本部队补充，以壮大自己基本部队的力量，因此广西才有这样的安定局面。其实，北伐后蒋介石对于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早就怀有疑惧。这几个军虽然地位与第一军相等，但战斗力、战功和威望都在第一军之上，在蒋介石看来，这是他实行独裁的主要障碍，不如北洋投降部队

驯服可靠。我说要把曹万顺、周凤岐等部队分散给第七军补充，正好触到他的隐处，他当然不能接受，而且很严肃地说：“全国的局面怎好与广西相比呢！你要知道全国各省各地未接受三民主义的部队有多少呢？他们如果看到曹万顺、周凤岐的结果不好，谁肯再投降呢？他们必定死战到底，革命就不能迅速成功。你不懂得政治上的道理，以后这种意见不要再说了。”我一向是以两广统一和反共的功臣自居的，那时并不把蒋介石看得很大。我碰了蒋介石这个钉子，心里很不好过，对他很有反感。

可以说，那时候我对汪精卫的信仰比对蒋介石好一些。正因为如此，我便上了汪精卫的当，几乎把命送掉。

汪精卫骗我去广州的电报

1927年11月上旬，我正在广西柳州一带巡视，忽然接到汪精卫个人署名的电报，说有重要问题要同我商量，希望我立刻到广州去面谈。电报里虽未说明要商量什么问题，但我也料到他回广州是想在广东另搞政治局面，而我对这个问题是相当有兴趣的。我素来就有两广小朝廷的幻想。当出师北伐、举行会议的时候，我就曾主张先把两广搞好，然后出师北伐，因为那时候在我看来，两广刚刚统一，基础是不稳固的。鲍罗廷（苏联政治总顾问）、季山嘉（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等都反对我的论点，我也就放弃我的主张，赞成北伐。但我自己并不肯亲自率兵北伐而是由李宗仁以第七军军长的名义率领桂军（第七军）的一半参加北伐，我自己则有意留在广西，想把广西搞好，作为万一失败的后路。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长江方面闹得乱糟糟，我想北伐是

不会成功的了，还是先搞好两广再说吧。我对汪精卫既有好感，张发奎、黄琪翔都是保定同学，也还没有恶感，同时，我认为两广局面由清一色的两广人来搞，比之同蒋介石的外江帮一起搞，可能搞得好一些。因此，我就立刻复电，说等候轮船，即行前往“聆教”，但并未说明哪一天动身。

我之所以毫不怀疑地答应前往广州，首先是因为汪精卫在广州开府的主张适合我两广小朝廷的幻想，并且对汪精卫有好感。我当时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我想汪精卫既然想在广东搞局面，必然要取得广西实力派的拥护，他如果先得罪了我，局面就搞不成，这种情况他们是应该考虑到的。这就是我认为到广州去没有危险的可靠的保证。

11月16日广州事变

我乘专轮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1月16日的中午。我一到就打电话给汪精卫要去见他，他约我下午4点钟到葵园见面。我准时去了，在那里见到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一班人，但是看不到李济深及他左右的任何人。我一进去，他们都愣住了，神情十分尴尬。我问汪精卫：“李任潮主席呢？”汪精卫说：“任潮先生因有要事，马上就要到上海去，不在这里。”他也没有说明他自己要同李济深前去上海。他又说：“季宽先生，你初到，路上辛苦了，请你休息一下，我们改天再谈吧。”其余的人一言不发，好像心里有什么重要事情似的（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正在准备欢送李济深去上海）。我看神情不对，就辞了出来，一路上盘算：为什么请我来商量重大问题而李济深又走了呢？为什么不让李济深与我

见面呢？为什么他们那班人用这样的神态对我呢？

我想来想去，这回来广州多半凶多吉少，就打算搭船逃到香港，但是省港的夜班船已经开了，只好回公馆里等到明天再说。入夜，我同妻子坐在小阳台上闲谈，看见马路上有些人坐着敞篷汽车，速度很慢，时时在我的门口经过，向我公馆里探望。我的妻子说：“天气已经很凉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遊车河（广东话，坐汽车乘凉的意思）？”我心里动了一动，恐怕是他们已派人暗中监视我了，但又不敢对她说。我俩谈到11点钟，就上床睡了。忽然冯祝万到来要见我，我的侍从人员告诉他说我已睡了，可否明天再见。他说，无论如何要立刻叫醒我一见。我披衣下楼，在扶梯上与他相见，他拉着我的手匆匆忙忙对我说：“得到确实的消息，他们今晚将有举动，目标完全在你的身上。你不管确实与否，今晚一定要避开为妥”；又说“任公已被迫走上海，我深夜冒险到来就是为通知你。”他说完就走了。

我平日对冯祝万相当敬服，他为人持重，不苟言笑，他说的话我是相信的；加以有日间的情况相印证，看来这个消息一定是确实的。于是，我就匆匆改装，一个人逃出后门，也没有对我妻子说到什么地方去，恐怕她知道了，会被他们追问出来。那时正是11点40分，我像丧家狗、漏网鱼一样，逃到西关我的秘书石楚琛家里，时时打电话回家里问，知道还没有什么事情。到夜里两点钟，枪声就必剥必剥不断地响了，电话也不通了，才知道事情出在我家里。我那时心里想，我虽然不是聪明一世，也就糊涂一时了，竟然中了汪精卫的骗局。他们认为我是桂系的幕后主持者，早就想搞我，而我自己一点也没有警惕。

我在石楚琛家里，终竟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会派兵到与

我有关系的人家里来搜查的。于是，我又一次改装，变成普通商人模样，天未亮就同石楚琛步行到西村火车站，想搭火车到韶关，因为那里驻有黄旭初的一师桂军，但是广州至韶关的火车不开了，车站军警林立，不敢进去。我也联想到广三火车也不会开，就又逃到南澳（广州西南方的小镇）躲了半日。挨到下午，再回到长堤，想看看香港船开不开，好设法逃走。长堤到处都贴满了“欢送汪主席李主席北上”、“打倒侵略广东的黄绍竑”、“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打倒桂系”、“打倒西山会议派”等等五颜六色的标语，我才知道这把政治的大火烧在我的身上了。省港轮船仍然照开，我趁临开船、人最拥挤的时候挤上了一只外国船逃到香港避难。下午5点多钟，这条船就像摆脱了钓丝的大鱼向珠江里游去，我就像出笼的飞鸟飞到天空，他们再没有机会来捉我了。我在甲板上面对广州吐了一口气，心里想：“此仇不报，非丈夫也。”等着吧。

在船上碰到我的妻子，她说，昨晚两点钟，好多军队包围公馆，把宪兵连缴了械，并打死了好几个人，是由姓吴的师长来搜查的。他审问我的妻子，问我逃到什么地方去了，还加以种种威吓。因为她的确不知道，才把她放了，仅许她抱了孩子同她的母亲出来，一切财物都不准带。

我们在香港的布置

我到香港住在以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邓彦华的家里，陆续逃到香港的人有冯祝万、张文（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李民欣（第八路军总部总参议）、邓世增（第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徐景唐（十三师师长），还有戴传贤、朱家骅、邵